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培育项目）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 2012

刘志彪 吴福象 等著

Regional Development Report for
China Yangtze River Delta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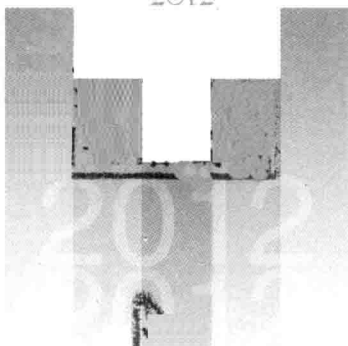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培育项目）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 2012

刘志彪 吴福象 等著

Regional Development Report for
China Yangtze River Delta

201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 (2012) / 刘志彪, 吴福象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培育项目)

ISBN 978-7-300-17730-4

I. ①中… II. ①刘… ②吴… III. ①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2 IV. ①F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6347 号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培育项目)

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 (2012)

刘志彪 吴福象 等 著

Zhongguo Changsanjiao Quyu Fazhan Baogao (2012)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2.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15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的理论先导，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突出。在我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过程中，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关系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进行谋划部署。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刻阐述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部于2011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

本建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奋斗目标。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等系列文件，启动了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未来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将着力构建九大体系，即学科和教材体系、创新平台体系、科研项目体系、社会服务体系、条件支撑体系、人才队伍体系、现代科研管理体系和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同时，大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有利的发展条件。高等学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必须充分发挥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等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中国方案和中国建议，为国家发展提供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政策咨询、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

自2010年始，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资助项目。发展报告项目以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数据库建设为支撑，以推进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校内外科研机构等建立学术战略联盟，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开展长期跟踪研究，努力推出一批具有重要咨询作用的对策性、前瞻性研究成果。发展报告必须扎根社会实践、立足实际问题，对所研究对象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等进行持续研究，强化数据采集分析，重视定量研究，力求有总结、有分析、有预测。发展报告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纳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文库”集中出版。计划经过五年左右，最终稳定支持百余种发展报告，有力支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新实践，适应新要求，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加快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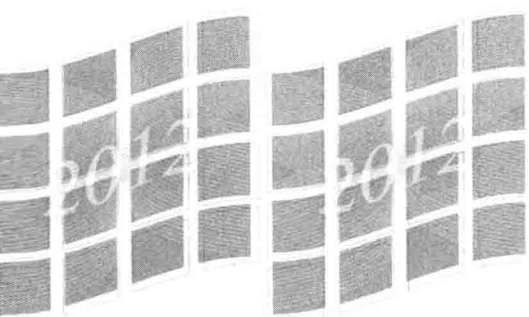
第一篇 总报告

第 1 章 长三角第二波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3
第 2 章 以城市化为依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16
第 3 章 从后发优势到创新驱动战略转型·····	26

第二篇 分报告

第 4 章 地方政府竞争与产业的分工演化·····	45
第 5 章 服务业协调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	64
第 6 章 托宾 q 阈值效应与企业投资理性·····	86
第 7 章 成本费用利用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102
第 8 章 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	115
第 9 章 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变迁·····	141
第 10 章 服务业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176
第 11 章 从人口红利拐点到创新要素驱动·····	188
第 12 章 从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	200
第 13 章 由制造中心向创新服务中心转变·····	222
第 14 章 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的转换效应·····	247
第 15 章 技术进步与结构转换的增长效应·····	257
第 16 章 成本领先向品牌差异化集聚转变·····	272

第 17 章	产业结构与专利权结构交互关系	297
第 18 章	行业集中的规模差异与创新绩效	307
第 19 章	改变政绩与绩效考核的制度保障	318
第 20 章	泛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园区合作	337
附录		350



第一篇 总报告

第 1 章 长三角第二波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刘志彪^①

摘 要

中国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其内核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不过，这一波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当前，中国加入或者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在扩大内需的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机遇，既是为了中国与世界的再平衡，摆脱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产能过剩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带来的加速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创新经济。

关键词：内需；出口导向；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中国经济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无疑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过去那种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亟须要转型升级。

^① 刘志彪，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在机会之窗稍纵即逝的千载难逢的时刻,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或者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的战略。

“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个战略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经济全球化战略,更意味着回归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而是要把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从而加速完成我国达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宏伟任务。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虽然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趋势和要求所做的一个较新的事实归纳和提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全球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加上人口众多,这些都使美国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美元长期的强势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要素和产品;第三,美国因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成功机会众多,也是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的创新要素的力度最大的国家,如美国就是当今发达国家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如消费文化和政治军事实力等。但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疑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本章将对这一战略的基本背景、内涵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剖析。其中许多观点基于我最近的思考,不是很成熟,现在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一、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特别是21世纪以来紧抓加入WTO的历史性机遇,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

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全球化放松了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不仅直接推动了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使我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使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亟须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物质资源消耗的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链条中,物质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等环节。中国在价值链底部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消耗总量不变,但是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提升。西方发达国家剥离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我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从而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这从间接资料也可以看出端倪,如2001—2010年,世界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排行榜中,均没有中国品牌入选。另外目前国际标准有24 807项,而中国主导制定的只有103项,仅占0.42%。^①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进行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据中国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 975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2011年6月末外国来华投资15 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②这一格局的直接和间接的融资效应主要表现为:(1)通过吸收FDI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这种依据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作为富国的进口国企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的投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

^①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传忠说:“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参见 http://intl.ce.cn/sjj/qy/201112/08/t20111208_22900637.shtml。

^② 中国2010年已成最大资本净输出国,参见 <http://dycj.yynet.com/3.1/1112/06/6569942.html>。

(3) 对富国低价消费品的出口, 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 使其可以在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甚至有所提高的基础上, 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各金融资产; (4) 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 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 (5) 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 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流回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 从而导致国内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下; 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 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被贬值的危险境地中。

第三, 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 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 但是在高端劳动力市场, 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业, 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 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地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在一篇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中, Autor 等 (2011) 就认为, 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 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 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 导致了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的上升。他们把其称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症”。其实, 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看: 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 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 中国制造业是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 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 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生产和出口为导向的国际代工, 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须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这种“温水煮青蛙效应”一方面使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而无法生存, 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 另一方面又使其逐步地得了两种病, 一是心脏病, 缺少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 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 或称为“心脏移植”, 二是神经病, 指“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较低, 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 可以预料的是, 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 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 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 降低过度的消费, 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 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因此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 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 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

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的需求方的原因。由此导致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自我强化,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当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上述“三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上述简单恶性循环又会出现。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2年我国在“稳中有进”的总基调下,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次将扩大内需提到战略基点高度,首次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是,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重要位置,强调要抑制以房地产为主的虚拟经济,将资源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但是由于中国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三个比重过低”的不良现象和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奋斗,因此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目前中国政府面前的严峻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顺利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因此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即使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需求面的问题,也不等于说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本土企业的市场需求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对中国人需求能力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的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①因此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升中国文化自身的自觉和自信能力,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第三,中国现在内需不振的问题,既是需求方的问题,更是供给方的技术水平问题。从微观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因此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的、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道路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高新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严重的被阻止性。由此很多学者和官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 R&D 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

^① 如宾利高级轿车 2011 年的销量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佳水平。宾利在中国的销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1 839 辆的创纪录水平。中国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宾利第二大市场。

入,坚决走“自力更生、自我创新”的道路。其实,与中国绝大部分重化工业发展道路一样,单纯的“自力更生、自我创新”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的封闭经济色彩,很难收到过去那种不计成本的军事工业发展中的实际效果。更多的竞争性的民用产业的发展,还是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可以利用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经济需要在扩大内需中完成转型升级的四大行动:(1)产业结构转换,即建立以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推翻以土地财政为支柱的经济体系;(2)需求结构转换,即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造为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3)区域结构协调,即要从根本上扭转东中西三元化发展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4)体制创新,即要打破政府主导的发展态势,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相互关联的四大行动必须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否则彼此失调就会产生彼此牵制。但是应该看到,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需求结构的转换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如因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差,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制造业的增长受惠于全球市场而服务业的发展则受到抑制;而转向内需之后,本地化特征为主的服务业就会得到市场的支持。再如在出口导向型全球化战略中,因“冰山成本”的制约,国际贸易首先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陆地区,因此地区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地区发展就会滞后;而当转向内需之后,国内价值链的作用会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基本内容

就学理上说,扩大内需战略并不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扩张外需和出口导向而言,与是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循环进程没有直接的关系,即扩大内需既可以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销售,也可以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而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无经济疆界的流动,它只与自力更生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因人口规模限制,其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

济产量点的供给量,因此一般都是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客观地说,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完全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中国逐步回归“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只是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修正自己的经济系统运行的偏差和单一的无法持续的经济行为。总的来看,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的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战略的前提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的前提是低端要素的价格具有比较优势。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的条件下,我国的低廉的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自主创新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而第二波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主要前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无法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来补贴外国人。向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提高原本应该提升的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使低技术、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出丧失竞争力。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的趋势。因此第二波全球化的主要的前提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

第二,战略的目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紧缺的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后来我国在资金比较充裕,特别是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国内流动性充裕,经济建设已经“不差钱”的背景下,继续维持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则更多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①,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

^① Krugman (1980) 提出的“母国市场效应”理论 (Home Market Effect) 可以解释如下现象: 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 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激励企业选择在该国家从事生产活动, 一个较大的市场会吸引更多生产差异化产品的企业, 并且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缘故, 一个国家会倾向于出口迎合本国需求的产品。

流动来解决。这说明中国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突破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的核心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在最初是顺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争取国外的资金和外汇用于国内所需机器设备的进口,虽然从实际运作中也得到了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但是这并不是战略最初的目标。1992年以来,战略的核心内容逐步演化为通过吸收FDI增进出口和用市场换技术。事实上,通过引进外资出口、让出市场换技术不可能吸收到国外真正的高新技术,出口所争取到的外汇也不可能买到国外的高科技,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放任形成现在将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的全球化战略,其深度主要体现在更多地争取全球高级的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至少以下几点:(1)利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2)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3)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的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的基本路径。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利用自己的研发设计优势和市场营销与网络品牌优势,向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发包。贴牌生产的企业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口味,经常采取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和技术等方式扩大出口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消费品出口激增而国内装备工业因缺乏市场需求而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刘志彪、张杰,2007),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的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国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显然,形成和利用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路径。

第五,战略的实施方法不同。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在对境外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引进来”,依靠低劳动成本,以高资源和高环境投入为代价,仅居于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制造环节,从发达国家角度看,是它们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向中国的发包,或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订单的接包。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基本的利用境外经济要